

阅读

第583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我“造”的第一本书

□ 麦 家

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和父亲曾有长达20年冷战，我将对父亲应有之爱尽量给了母亲，怨恨却像棵树一样长高长大，长出了年轮、粗皮。从一个角度讲，我长大的标志是将对父亲的怨恨从日记里亮了出来，明码在日光下、日常中。这当然令人羞耻，但恬不知耻的我不以为耻，我的脸像知更鸟的蛋一样蓝，不是红。有人说，我这是为当作家埋下了种子，因为父子冲突是文学母题。我无语，脸像映出蓝色火焰的烙铁一样红。

命运齿轮嘎嘎转，转到某种神秘约定中。1986年，受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启诱，我勤奋的笔不甘心只写日记，开始写小说，并有幸在多年后出了第一本书《紫密黑密》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）。书寄回家后，母亲给我来信说，父亲捧着我的书在村里大走了一圈。那是一个6000人的大村庄，我不知父亲要多久方能走完一圈，只知父亲之后还要走一圈又一圈——母亲说，像抱着个大孙子似的，不遗余力地广而告之，鼓吹我“造了一本书”。父亲读过半年私塾，去过杭州、上海，能看报纸。他知道书是写出来的，但他偏不说写，偏要说“造”。

这是他的创作，也是他的创造。

无疑，“造”比“写”更形象、更壮观，也更符合一个农民的语法。从那以后，我赋予自己一个私密的称谓：造书的人。这是个小小的收获，意味却是深又长：我和父亲久深的冷战大抵就是从此开始消融，如冰封的大地回春，我鼓励自己输出优秀的情感，拒绝简单粗暴，而是成熟、理性、高尚地对待过往、过错、过失。这是个不错的话题，令人愉快，但不宜在此赘述。

命运齿轮不停转，转得我晕头转向。作为一个写作者、造书的人，我经常不理解自己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造书人，因为童年是那么不幸——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，我有童子功，心中有淤泥要疏浚，造书是我的命，也是渡我的桨；有时我又觉得自己并不配造书，因为我造一本书是那么难受，每每都是殚精竭虑，颠来倒去推敲、修改，又不免死腹中，这样的惩罚像季节一样更替不止。两种感受像冤家死对头，从不悔改，不时神出鬼没，搞得我时常厌倦人世、怀疑人生。但人生怀疑也得过啊，就这样我过了青春，过了中年，过了花甲年，“造”了一堆作品，有所谓的“谍战三部曲”（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），也有《人生海海》《人间信》等这样的“故乡曲”。

毋庸讳言，现在中国传统小说处于窘迫的境况，读者不买账，小说在日益边缘化。像一对朋友，关系有些微妙，甚至有冲突。我以为，这时我们小说家尤其要拿出姿态，为小说前途思虑，不要太自以为是、自私自利，必须开阔心胸、眼界，练好金刚钻，拿出真功夫，而不是耍弄人的小把戏。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方面努力：放下小说家故作高深的姿态，改变传统小说的腔调，从语言和故事层面寻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、激发好奇心的阅读。我像克制体重一样，克制小说故作高深，克制使用难字、生字、涩词，同时忌惮平铺直叙、线性叙事、流水账、无技巧。我不想装深沉。这不是一对矛盾，而是今日读者给我们下的战书。

（摘自2025年4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当忍喜

□ 刘诚龙

吕大防，陕西人，是个大好人。《宋史》称他是三大好人之一：“大防重厚，（刘）摯骨鲠，（苏）頵有德量。三人者，皆相于母后垂帘听政之秋，而能使元祐之治，比隆嘉祐，其功岂易致哉？”《宋史》也单论他品，“大防朴厚慈（蠢）直，不植党朋，与范纯仁并位，同心戮力，以相王室。立朝挺挺，进退百官，不可干以私，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，凡八年，始终如一。”

好人不得好报，乃一大痛点。吕公朴厚蠢直——这人品当然是受害型的，他还不植党朋，被人踩了，都没人来挺他。

职场没人挺他，老百姓还是挺他的。吕大防一路贬谪，贬到虔州信丰（一说是江西信丰，一说是江西瑞金）。吕公还在路上，虔州一位老翁做了一个梦：一个伟岸男子，橐橐远道而来，直入其家，不进客厅，不落大堂，径入其楼。楼上摆放着一副棺材，那是老翁为自个备着的千年屋，来者向老翁打了一躬：“这寿材放最佳地，好生守着。”

话未落，老翁惊醒，没请周公来解梦，解梦的人来了，便是吕大防。吕公生得伟岸，他身高七尺，眉目秀发，声若洪钟。但见吕大防入得家来，老翁惊讶不已，这就是他的梦中人。其时吕公七十有余，长途跋涉，早已病了许多时日，走不动了，安歇在老翁家。不多日，他双腿一蹬，飞升去列仙班。老翁验之所用，正是这副本来给自己准备的寿材。

说来，吕公被贬，完全是皇上受人谗言，一时震怒的判决。北人南去，水土不服，这般流刑着实相当于判死刑。吕公上路很多天了，宋哲宗生了点恻悯之心，欲下诏，着吕大防回朝，“以示宽恩”。换言之，宋哲宗的想法还没落实，也就是好事将成未成。

宋哲宗对吕大防的哥哥吕大忠说：“执政欲迁诸岭南，朕独令处安陆”，安陆是湖北，还算北方，不是瘴疠之地，而“执政”要贬吕公去岭南。这个“执政”者，是章惇。有时主子不太恶，奴才更比主子恶十分。宋哲宗告诉吕大忠：“大防朴直，为人所卖，候三二年可复相见。”

吕大忠听到皇帝想赦免并重新起用他老弟的喜讯，喜不自禁，逢人便说，皇恩浩荡，老弟有救了。他的这份喜悦，一传二，二传三，三传万人，传到了章惇耳朵里。小人的厉害之处是，几个君子奈何不了小人，一个小人便可以害惨几个君子，所以在好事没成真时，千万千万不能透露喜讯，不透露是喜，透露则是悲。

这下，章惇坐不住了，连忙召集其朋党开紧急会议，“章惧，绳之甚力”，会上把蛮多重罪之词，加到吕大防身上，代皇上言，说他“背天地之恩于先帝”。加重罪状，自然是为了加大处分力度，本是贬谪到湖北安陆的，再贬千里，“绍圣四年，遂贬舒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循州。循州者，今岭南。”

经过此番折腾，吕公“至虔州信丰而病”，他对随行的儿子说，“吾不复南矣。吾死汝归，吕氏尚有余种。苟在瘴乡，全无生理。”吕公说完这令人哀伤的话，说“遂薨，年七十一。”这个二次处分，直接导致了吕公病死他乡。

人生在世，莫说痛苦得忍着，喜悦也得多得忍。无他，世界上有好人，世上也有坏人。你分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喜怒最好自己收藏着。蛮多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，章惇便是。章惇一朝权在手，便把恶来行，他贬谪吕大防如此，对司马光也如此。本来已给司马光处分了，贬于他所，夺去恩例，他不枉称不称心，再次加刑：“近降指挥，以司马光等造为奸谋，批毁先帝，变更法度，各加追贬。”

章惇与苏轼曾是朋友。他对苏轼下起手来，也真个是辣手摧花。他当权，先把苏轼贬到惠州，苏轼是天然乐观派，过几天就适应惠州生活了，生活蛮幸福了，写了一首诗：“白头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章惇咬起牙齿，“苏子尚尔快活邪”？好，叫你快活去，“于是重议，草制诬谤罪，再贬为琼州别驾”。

范仲淹说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”大概也已参透人性的复杂——物喜有人嫉，己悲无人惜。在判断不出微友、文友、校友、学友、幕友是何友之前，就先修炼定力，不悲不喜。确定他是君子，再去分享快乐、分担痛苦，不为迟。

（摘自2025年4月7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。

——刘向（汉代）

当我们读书时

□ 江蕴琪

周末去光华楼自习，发现二楼大厅正在举办主题画展，其中一幅名为《文心海上》的画，勾勒出复旦旧书店的内景：成摞的书聚散纵横地摆放着，木质的楼梯通向小二层，斑驳的书架上挂着绿叶。青年学生俯身挑书，垂暮老人倚着书堆须臾品读。

本以为这家书店早已淹没在历史中了，上网一查发现它搬迁到了政肃路。从学校东门出去，拐几个弯，画上的小书店就从二维的画面跳入三维的现实。格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依然是以书为梁以书为栋，一切房屋架构都被隐去了，似乎不是书被塞进了这钢筋水泥构筑的立方体，而是靠这些书支起了这个空间。吱呀作响的木质旋转楼梯和二十厘米高的小木凳，与几公里外复旦管理学院新院区朵云书院的钛合金穹顶、数码蓝光屏形成鲜明对比，恰如这个摩登时代里的一枚活化石。

旧书，目及之处皆为旧书。它们乱中有序地匍匐在书架上，不分年代，不分题材，不分装帧，不分语种。写生画集散落的抛光页降落在精装的名人列传上，斑驳的古希腊哲学在睡前童话耳边低语，封面卷边的《聊斋》在二手教科书旁诉说着诡谲离奇的故事。刚刚在一楼翻阅了去年的《半月谈》，又在二楼转角偶遇了80年代的电影杂志。整个书店就像是一张人类精神文化碎片拼成的地图；把所有书名浏览一遍，就看完了一个无序的故事。

突然异想天开，如果一个人从书店入口的第一本书开始读起，一本一本昼夜不停地读，恐怕从童颜读到鹤发，穷尽一生也走不出这家书店。而且没等他读完三分之一，脑中第一本书的内容恐怕就已模糊不清了。但如果是AI呢？瞬息之间就可以把所有书每一页文字、插图、注释收入囊中，不仅准确无误，而且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消逝。

如果真的有人做了这件事，把一家店的书都录入到AI的数据库中，那这家店，这些书们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

AI当然快，因为它无需甄别，无需理解。它把百年晨昏碾压成冰冷的碎片，把丰满的骨肉压制成了无生气的标本。无论是孔子的哲思，但丁的诗句，还是三流小说的桃色故事，统统平等地倒入文本的粉碎机中，千万纸张堆叠的厚度，扁平化为密密麻麻的数字点集。相比之下，人实在是太慢了。

但为什么一定要快？

打开书本，眼睛跟着一行行文字转动着，大脑竭力理解的同时，指尖还感受着纸面的纹理，鼻息间也充斥着书本的清香。灯下读的是湘西的灵山秀水，脑中却不由自主地对应着上周刚去攀登过的那座小山丘的图景。看见书中清丽温婉的女性形象，眼前自动复现小学温柔可亲的语文老师。思绪在书本和个体之间拉拉扯扯，一个小时下来不过读了十几页，但这本书已经不再是读之前的那一本：因为被翻动过，被胳膊肘压过，封面不能再像刚买来时那样紧实地盖着，而是微微翘起；原本空白的页边留下了注释，感想或随心所欲的勾画；油墨文字感受过湿润的目光，变得更加丰润明朗……

AI“读”一本书，不断压缩、收紧，留下扁平干瘪的数码和点集；人类读一本书，不断扩充、膨胀，填入独属于自己的回忆与体验，将岁月塞进夹层，留下一本残存着指腹温度的旧书。AI将书本折叠为数码，旧书却折叠了人类的时间。

我们读书，不是以人脑和数码进行赛跑。作者建筑了一本书的基模，经出版、印刷，上架，有了千千万万个克隆体，每一个克隆体到达各个读者手中，读者亦把自己的灵魂融入，构成了书的一部分。正如同一栋楼的住户接手一模一样的毛坯房，各自刷上不同颜色的漆，挂上不同材质的窗帘，搭配不同的家具饰物，遂独享各自与众不同的小屋。读者手中拿着的，是书页中夹着糖纸和夜读月光的独一无二，是文字上勾画着线条和批注的独一无二，是某一页因被反复摩挲而边缘翘起的独一无二，是书脊微微磕破剐蹭的独一无二，是只能让他想起那次旅读风光与心情的独一无二。

我有一本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，初二的寒假我一边吃着柠檬凤爪一边读它。书读了一页又一页，凤爪吃了一包又一包，汁水滴落在书页上，大卫颠沛流离、绵长蜿蜒的一生被迫泡着凤爪酸香的气息进入我的脑中。直到现在，这本书依然通体散发着柠檬凤爪的味道，每次重新阅读它时，这股味道带着初读时的体验、带着寒假悠闲惬意的回忆直冲而来。这是我独一无二的，柠檬凤爪味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。我想，每一个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的读者都有他们独一无二的一本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。

想起余秋雨先生的《藏书忧》。藏书是一个人的精神空间，藏书者不愿让自己的藏书流散，亦如不愿让自己的灵魂支离破碎。一屋的藏书如此，一本旧书亦是如此。

作者塑造一本书的灵魂，读者充满了无数本书的灵魂，AI压扁，嚼碎书本。那么，我们要任凭灵魂被嚼碎吗？

无意抨击造福人类的高新科技，只是在众说纷纭、人声鼎沸中，以知识接入端的角度说点自己的感受。如果有一天AI真的统治了世界，希望它大“人”有大量，不要揪住这篇文章，问罪于我。

（摘自《夜光杯》公众号）

（●图片来自网络）